

以路为媒：基于导航地图的媒介实践与自我韧性

陈世华 陈方圆

摘要：技术创造出一个可居于其间的数字媒体生态，个体经由导航地图的媒介实践在其构筑的拓扑关系网内进行文化行为的展演并构建日常生活的意义。聚焦人在移动过程中具体使用导航时所产生的时空关系变化、情物纠缠，发现位置媒介为都市漫游者的移动行为提供了可以提前规划的指引，地点位置的停留与具身的接触结合催生流动的情感记忆。然而，当导航媒介的运行出现不同步、冲突等障碍时，这些断裂点的出现也是个体认清真实与虚幻，进而走向韧性自我的关键。

关键词：数字生命；导航地图；媒介实践；韧性自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25)06-0040-09

基金项目：江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XW22106)

一、问题的提出：悬浮社会的数字人生

数字媒体生态为处于农村的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可以塑造完美形象的“数字人生”，其可修改与可编辑的可供性常常令处于思维并不完备的青少年分不清何为虚假、何为真实。于是，紧贴城市的审美与跟随消费风尚的青少年在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中，在巨大的城乡差异以及自身生存环境的变化下逐渐认为虚拟世界积极营造的自我是完美真实的，但也在具体的媒介实践中渐渐消弭了乡土文化的底色，在价值追寻上也更为离土化，这些历经工业化之后脱离土地的无产阶级被马克思最初称为“浪荡游民”^[1]。之后，都市中的“拾荒者”^[2]这一概念被本雅明捡起，而后发展成为社会观察家与都市居民的原型，亦称“漫游者”。在本雅明那里，都市一方面被认为是充满消费、视觉刺激的地点，漫游者在现代都市角落游荡。另一方面被视为陌生人短暂邂逅、交易且人际疏离的社会空间。本研究所界定的都市漫游者即从这一背景发展而来，从乡村到城市迁移，既是都市漫游者们自身生存环境的极大变化，也是自我身份不断协商与变动的过程。悬浮，成为生活在都市中农村青年真实的写照。作为在都市中悬浮着生活的人类，导航媒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存在，没有导航我们走不了路，没有依靠就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导航地图构建的媒介世界，既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设施，也塑造着我们的情感、记忆与生活的历程。但同时作为技术制品，导航并不能为我们构建一个完美世界，诸如当出现失灵、路线不准时，我们总归还是需要诚实地回归现实世界，具身问路。基于此，本研究期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①基于导航地图的媒介实践呈现出何种时空性？②作为一种“数字记录本”，导航地图以某种形式记录了我们所经历的细微光景与片段，这些媒介物的文化意涵是什么？③人的身体在漫游都市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④拓扑关系状的导航路线为处于悬浮状态中的都市漫游者给予何种指示？都市漫游者应该走向什么样的自我？

二、文献综述：情物纠缠的位置媒介

（一）遍在化与融合性：位置媒体的基础设施化

位置媒体何以成为基础设施？梅洛维茨对电子媒介的一个基本观念是：“电子媒介几乎完全断

绝了物质地点与社会‘地点’的联系。当我们使用电话、收音机、电视或计算机进行交流时,我们身体所处的地方不再决定我们在社会上的位置以及我们是谁。”^[3]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将个体所处的位置从物理空间冷酷“拔”出,使得传播也只变成漂在虚拟空间中的、无交通的符码传输。但事实上,传播的过程离不开真实环境中的地理媒介,概因卫星定位系统、位置导航、地点标记等数字应用已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存生活。人们既可以使用位置媒体导航、寻找陌生地方,又可以开辟新地理场景、传递信息、构建新社会关系。正是个体在都市的身体移动中,位置媒体最直接地与来自现实世界的物理位置相互映衬,激活了物质空间的地理性与城市的媒介性。因此,遍在化与融合性成为我们理解位置媒体的两个特点。

导航媒介的生成需要物质层面的基础设施储备。网络基站、数据中心、互联网协议规约导航媒介运行的网络;算法工程师、普通用户、互联网公司为主体对位置媒体进行制造设计;而行业标准、政府职能部门等维持正常社会运行机制许可亦是导航媒介使用的前提。这三个部分交错连接,叠交成位置媒体运行的基础性网络。在文化的意义上,人的日常媒介实践与位置媒体相嵌合而生成一种混合式时空。一方面,作为内嵌于身体上的可穿戴设备,位置传感器将人们所经过的道路、角落、打卡点等的数据踪迹以一种不可见的形式进行搜集,其成为获取信息、连接他人的重要接口。另一方面,定位技术作为连接人们所居的虚拟与现实、物质与意识的中介物,打通分裂的二元论视域。正是在人们移动的过程中,社会交往、数字信息和物理空间三个元素叠加融合而产生出一种新型的流动空间^[4]。这种融合从城市表象看,是大屏幕、手机等狭义媒介嵌入城市空间,延伸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深层结构看,是计算机的软件代码系统与城市各个系统的交织纠缠,规约城市结构与运行方式。位置媒体、身体与城市进行链接,城市已然成为一个融合人、物、技术的多重网络的复杂系统。因此,在硬性的数字技术与人的文化性使用的过程中,位置媒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器物,而是为人们的行为赋予意义、规划流程与生成情感。本研究基于导航地图的媒介实践即是在“技术—文化”共生的理论资源下展开。

(二)虚实结合:新移动范式的交互共生

Shell 和 Urry 受鲍曼影响,提出了移动性理论,代表着一种新移动范式。新移动范式综合调适游牧理论和定居主义概念,是对当代社会科学将一切事物看作“静止的、固定的和既定的”观念的挑战,意在探讨社会关系如何通过人、物、技术、制度等人和非人行动者编织而成。与此同时想要解决的是关于在全球化背景下,个体的民族和国别、身份和归属的文化议题^[5]。具体来说,新移动范式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非表征。从克利福德·格尔兹的一句“人是悬挂在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6],传播学研究就深陷关注表征符号的既有窠臼之中,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然而,在媒介的符号再现之外,还有什么被忽视?这也就涉及人体与数媒接合、日常生活与数字技术绑缚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间隙”。而这些未能为技术描摹的湍流、转向等“缝隙”,恰恰揭示出移动媒体使用中的异质与活力。数位媒体的非表征体现在其一是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流动性不仅仅是把人和商品从 A 地运到 B 地,而是包含了多种社会经验的实践经历。”^[7]正是在数位媒体的移动过程中,物质技术和符号信息相互组合编排,奏写不同的话语模式,从而促进人、文化的互动与流通。从这一层面来说,意义之网不仅是由符码所编织的,同时也是由踩在路上的小径构成的^[8]。其次,重视身体感官的重要性。互联网上展演的身体以符码的形式呈现,然而,与此同时遮蔽了物质地理空间中“沉默的肉身”。事实上肉身的姿态、感官、移动的节奏等皆影响着个体的知觉经验与传播质量。重视身体在传播中的作用,也是强调“身”与“心”的结合。身体在游移过程中感官的节奏、韵律、快慢影响着心灵上的情感体验,而思想上情感的流变又感染(affect)着个体移动中的身体步调,这意味着身体、感官、情感从来都是辩证、衔接、交织的存在。

第二,新地方。定居主义主张人地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认为固着的才会带来属于地方的归属

感,但忽视了当大宗的技术物变为隐形的、不透明的、与人的身体耦合时,媒介本身的传播价值。与之类似,游牧主义则过于强调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流动过程,而流动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流动感及意义性被强烈遮蔽。固定的不流动、流动的不固定,长久以来僵化的二元对立地理范式已然是建构新移动范式的最大阻碍。Urry 等提出的新移动范式恰恰是对游牧主义与定居主义的调音。首先,新地方“新”在超越分裂的虚实空间观。随着数位技术与行走媒体的发展,空间生产与媒介技术更为深度嵌合。一方面,记忆、情感、认同等构成的亲密经验是界定个体地方依恋、地方空间、地方生存的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当前的数字媒体提供了物质与精神、身体与心灵的新融合。在此间意义上,地方的存在也是人的存在,地方是“居”(dwelling),人类的存在正是扎根于地方。^[9]另一方面,地理媒介的介入为重新激活无远弗届特定地理的空间性^[10],探究技术工件融入人体、开辟新移动社会时空提供了一个多样注脚。其次,新的地方观注重流动过程中的停泊、驻足。“地方是运动中的停顿。”^[11]与游牧主义所推崇的浪漫化的、完美的乌托邦图式不同,新移动范式在全球通信和交通系统中会涌现出反乌托邦的一面,一如 Parker 研究的集装箱的移动轨迹,“集装箱的流动会带来隐藏的差异和危险”^[12]。辩证的是,移动中的停泊也并不是消极的,人们在驻足的过程中仍然会对重新出发、再度移动充满期待^[13]。驻留的过程虽然不如工作和居住空间那样持续和固着,但也是人们经常重复抵达的地方,“人们在此即便不是‘成员’也是‘常客’”^[14]。

第三,关系论。注重物质、技术、制度、人与非人等各行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即反思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与本质主义的倾向,吸取来自 ANT(行动者网络)视角中将各行动者共同放置于同一网络之中的共同型构(figurate)过程。在这一视角的认知下,移动性是由人类和非人类共同编织的一幅“混合地理景观”。当以拓扑学的方式去了解每一行动者在由元素、关系、连接和节点所构成的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时,那么关于新移动范式所研究的重点就从“媒介帮助我们达成了怎样的目的”转向理解“传播是以何种范式嵌入到某种关系中去的,又是以何种方式呈现为某种社会关系、并建构关系网络的”^[15]。在此意义上,既不将媒介的角色视为工具性的被动角色,也不一厢情愿地将人或技术抬升到中心的位置,“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统治这一切的既非人,也非媒介技术,而是纠缠,这种纠缠囊括了各类实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力。”^[16]关系论视角下的新移动范式,人员、信息、物质、技术、媒介之间相互纠缠、混沌难分。与此同时,在关系节点上,各个行动者也各自挥发生成、成其所是。

基于上述梳理,本研究将处于都市生活的青年人作为研究对象,其处于从学生到职场人、从校园到社会的身份转变过程。一方面,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漂泊在大城市,难以在大城市扎根,而又不得不继续生活、工作。另一方面,故乡又是他们回不去的“远方”。在城市与故乡之间,这些年轻人的生活始终处于一种时刻想逃离但却不知逃向哪里的悬浮状态。此时与媒介的相连为在城市游荡的观光客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排解焦虑迷茫的渠道。本研究通过都市漫游者的媒介实践,观察具体导航实践中的时空关系、个体的情感状态,来探讨漂泊的年轻人在漫游过程中的文化心理过程,探索“人—技术—媒介”联结的技术文化理论及解释框架。

三、研究方法和方案设计

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置于流动的时代背景下,致力于从其日常生活的媒介实践出发,观察人本身行走过程中细微的、可触的、异质的痕迹,以此探赜漫游者实践中的技术、环境、身体之间的相互纠缠,期望对城市中的“地方性”作一新媒介环境下的新理解。首先,笔者从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期间在豆瓣、贴吧、微博、小红书等以#漫游、#citywalk、#徒步、#城市散步等行走标签的话题发布中进行App漫游,对行走者分享的数字文本进行细读。其次,笔者以实地经验,对杭州、上海、武汉等城市以具身的方式在不同的城市行走,期望可以得到行走者的共鸣。最后,通过在小红书、豆瓣等平台招募都市行走者的访谈人员,招募访谈的要求包括:①都市行走时使用导航地图;②在社交账号分享

关于都市行走时的所闻所见;③使用智能设备等(例如手环);④提供自我的导航足迹视像。访谈问题围绕行走的原因、行走过程中的新感受、行走过程中的归属感、使用/不使用导航地图的不同等探究个体在行走过程中的技术使用、城市感知、时空性质等问题。在本次访谈中,共招募到18位访谈者,每位访谈者均进行40分钟到2小时之间的语音交流。具体的访谈信息见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概览

编号	性别	年龄	职业	现居住地	漫游习惯	访谈方式
1	女	28	新媒体运营	湖北	5年	微信语音
2	女	26	工程师	德国	7年	腾讯会议
3	女	22	学生	江西	3年	微信语音
4	女	23	学生	安徽	5年	微信语音
5	女	24	学生	上海	3年	微信语音
6	女	20	学生	北京	2年	微信语音
7	女	27	外贸从业者	上海	5年	微信语音
8	男	23	学生	山东	2年	微信语音
9	女	23	学生	山东	3年	微信语音
10	男	29	技术管理人员	上海	5年	微信语音
11	女	26	行政	广东	3年	微信语音
12	女	22	教师	山东	4年	微信语音
13	男	24	文员	福建	3年	微信语音
14	女	25	教师	浙江	3年	微信语音
15	女	19	学生	广东	2年	微信语音
16	女	23	学生	浙江	3年	微信语音
17	女	24	翻译员	河南	3年	微信语音
18	女	26	面点师	四川	3年	微信语音

四、情之所依:指引航行与时间收集

(一)寻找定位:不确定性中的“指引航行”

流动,是弥漫在现代人中的心理状态:“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但一切又不能充满自信与确定性地去应对。导致了无知感、无力感以及一种难以捉摸、难以确认和定位的担忧,一种没有靠山却绝望地寻找靠山的担忧。”^[17]在鲍曼看来,后现代中的每个个体都生活在前所未有的自由当中,然而却始终处于一种焦虑与不确定性的模糊状态。个体既不能摆脱已有的身份又陷入新的自我认同焦虑:如何寻求稳态的身份,如何在不确定的关系之中与他人建立扎根之处^[18],又该如何认识自我。正如受访者18号所说,“我经常戏称我在成都是外地人,但是我到了外地,大家又都会把我当成成都人。”

一方面。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嵌出来的个体面对大都市时,未免有彷徨、惶惑之感,不清楚自己去往哪里、定位如何,心理地图的缺失导致个体身份认知上的混乱与迷失;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组织的不断理性化与程序化导致个体的道德责任逐步失落、个体道德能力退化,心理地图上的“道德空间”又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内心充满冲突的个体患上了大都市中的“道德冷漠症”,习惯于对他者“面孔”的忽视与遗忘,进一步加剧个体间道德与情感连接的脆弱性。而此时都市个体进行行走不仅是尝试缓解来自都市发展中衍生的现代化焦虑情绪,更是进行自我方向的重定位,重新思考自我与他者之间、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在行走的时候,导航地图在“都市之旅”中为“目无所

指”的个体提供了一个可锚定的坐标系,一个在繁乱的线路图中发挥着“指引向导”(受访者8号)作用的风向标。一则,在偌大的导航地图中,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遍在化,几乎城市的街道、地点乃至胡同都被标注进地图中,使得我们在游观一座城市之前,能够对陌生的城市有大概的了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心理上的“未知恐惧”。二则,导航地图显示的箭头、响起的语音、三维的地图景观皆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熟悉的信息环境。即使在迷路时,也不必害怕,因为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保障性技术”(受访者16号、18号)。“导航对我来说更像是给了我一种安全感,你会觉得因为导航在不会那么迷茫,你知道你要去哪里走哪条路更近,你对这个城市有一种初步的了解。”(受访者16号)

需要注意的是,看起来可持续可预测的基础技术可以成为我们坚定的依傍,但每当走到迷路城市,例如重庆时,此时的导航地图可以说是“完全失灵”,此时多数行走者则又复归到传统的具身方式——问路。导航地图覆盖的线路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处于一种“全织网”的严密性,反而会充满漏洞、未有技术所通达之处,其地点的更新也“充满滞后性”(受访者11号),在这个时候我们反而需要自身的肉身实践、以肉身标注的形式帮助导航不断精进其大脑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恰恰需要反躬自省,以自己的亲身实践去“修补”技术这种介于“连接”与“断联”的模糊地带,此时,这种障碍点反而成为个体进行自我确认、重新思考人-技关系依赖性的重要佐证。导航地图可以为在外向迷失的我们提供一个指引的航向,但在线路关键处与转折点时,我们唯一能做的或者获得内心秩序感的来源不是“从他觅”,恰恰是需要回归肉身,在自反中“得遇逢渠”。

(二)差异集合:异质散点的时间辐奏

媒介以前无所有的力量重构着时空演化的结构。在如今时间的加速与持续性成为常态运行的情况下,断裂与减速作为“时间机器”中的异轨者反而被视为异化社会中的“例外”。但从现象学的视角来说,寻求减速或者在断点的时间维度上生存恰恰是个体真实的生活状态。比之导航装置,在地图中记录的行走角落、轨迹、地点常常是碎片的、间断式的,这种参差错落恰如生活本真的粗粝跳动。而在虚拟与现实深度耦合的情况下,这些记录在导航装置中的数据则又反映人们生活着的数字生命。不同形状的数字轨迹、不断累积的里程数、不断积累的打卡点以一种数字语言的形式记录人们在虚拟空间中的留痕,从而使得个体在对经历过的城市进行回望时,唤起人们的情感世界。“在不断变化的过去和仍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永恒过渡这样一个正在消逝的点……‘此刻’与其说是时间‘中’的裂沟,不如说是时间‘的’裂沟。”^[19]从A点到B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个体在行走过程中的时间是自然化的时间,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流逝。当媒介技术作为一种可以描述时间的机器,它就变成承载时间、分化时间、描述时间的装置。我们可以从个体的导航使用中管窥时间的节奏,而这个时间的节奏恰恰是“散点”。导航地图作为描绘时间的媒介技术,可以说反映着行走中的“散点”时刻,这突出体现为个体在行走时间中是断裂的、异质的、“崩塌的”,但恰在这些与一维的时间刻度不那么协调的时间刻度中,显影出同质机器中人-地-时间交错的新奇(exotic)体验。

我觉得在行走的过程中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在走路时,一直在接触新鲜的体验,有新鲜的感受。太阳的升起、降落我能比较精确地感觉到。如果是一直打游戏我就没有任何的感觉。(受访者4号)

个体在行走中的时间并不是扁平的,而是活跃的、充盈的。无论是罗萨加速社会对现实时间压缩的批判,抑或韩炳哲对于现代时间的判断,当代的时间危机是紊乱的、忙乱飞驰的。而当我们视角转向“生活的时间”,则可以发现这种不是等律的时间节奏,记录的恰恰是属于个体在机械复制生活中独特专属的时间味道。

我走了一段时间已经很疲惫了,我就在亭子里坐着,过了一会儿突然间传出了歌声,随着歌声看去那些爷爷奶奶都是退休的,他们自发地组织到一起,奶奶们在唱歌,爷爷们用乐器伴奏,每个人都很优雅、状态也非常好,令我印象深刻。(受访者17号)

此外,碎片的时间与数位技术嵌合,谱写着关于流动城市中的时间剧曲。仔细观察导航地图嵌

人的新功能,那就是“点亮角落”。角落点亮的条件是:“已注册高德账号、开启足迹记录授权。”地图上“角落”显示的是时间的“点状”痕迹。一座城市中的角落不是位于流量大的中心街区,而是在“镇、乡”等流量小的地方。而正是在这种人流量小的地方,储存着我们的“时间微光”。这些无名的碎片,也是一个个异时性的表征,它们来自过往,却往往指示当下,异质性被艺术地揭示、聚集与放大。不同于宏大的时间叙事,“角落”书写出的是关于人们行走过程中的“断痕遗迹”,个体在这些散点的时间中体验、交流、与自然物进行亲切接触,以细琐的时间切片诠释浩大。

新的制图方式不再仅仅是以表征、符号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呈现。相反,制图是用户个体对地图的介入式日常创造,人们在行走的路程中,也不再刻意地去描摹轨迹,而更多地未经过有意识的表达,便不自觉地参与对地理信息描绘的一个过程,导航媒介正在将人们日常行走散落在各个角落中的地理足迹刻进数据系统,并在之后的时间岁月中,会以“复走”“重新打卡”的方式对行走过的路线与行走痕迹进行再度回访。

我现在想和朋友一起再把我之前走过的那些点再重新打卡一遍,我想看一下在那些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城市、同样的旅游计划中,我一个人在行走与两个人在行走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以及我现在心境的变化、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的想法。(受访者9号)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们的数字地图的动态生产,既是虚拟的也是实质的,既是动态的也是静态的,动静、虚实的二元对立与区隔被打破,而更显现出流动的意蕴。这些行走中的时间碎片、时间角落,“打开了以前可能被封锁的通道——尽管是非常规的——让栖居者找到自己的‘穿行道路’,从而在错位的断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0]在生存论的意义上,时间从来不是工具性的存在,而是关于个体存在于世的价值,正如卡洛·罗韦利所说:“我们栖居于时间之中,如鱼在水中。”^[21]

五、物之所凭:人地爱欲与点亮生命

(一)“漫无目的也是目的”:驻留附近催生的人地爱欲

不到百年的时间,我们再一次体验到“空间-距离”(distance-espace)的渐渐消逝^[22]。通讯技术已不再改变我们对于时间与空间的观念,而是力图把它们消灭。当我们完全沉溺于虚拟空间时,过度连接而导致主体意识的消弭,没有真实生活的丰富与充实,我们的生活缺失了舒展的时刻,是无地方(non-place)的,缺少认同和生活的意义感,如同项飙先生所说,丧失了看见“附近500米”^[23]的能力。而都市行走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沉溺的虚拟空间实现间歇性的断联,重新将耳朵、眼睛等具身感官介入“附近”,在具体的地理空间中真切地体验环境、建构认知。

我很喜欢行走中周围嘈杂的声音,这个嘈杂不像是刻意制造的音乐,不是说为了某一种艺术,而是大家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当下的感情。这样的声音糅在一块,你虽然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但是当下的环境会让我觉得内心放松。(受访者16号)

更像是脚踏实地地接地气,跟外界环境融为一体,会听到当地人的交流、注意到他们的气味、他们的温感。(受访者13号)

Katz等认为,在互联网与日常生活深度嵌合的当下,人们与网络处于一种永不停歇的连接(perpetual contact)中,当人们在具体的地理位置,深入到立体三维的实体空间,则是穿透景观的幻象,解放“过度使用”的感官,以停下的脚步驻足沉思,从而在与日常生活遭遇的“诗意瞬间”中,找到自己内在的真正需求,体验生命的本真。^[24]在漫游城市的过程中,文化象征物能够唤起个体尘封的过往记忆,令其在过去与未来结合的当下,借助于抽象想象,让漫游者们在漂泊的城市里找到熟悉的归属感,从而使得其具备一种融入陌生之境的认同感。这种象征物不仅包括特定地区人生活的饮食、风景等物质性物品,也包括非物质性的乡音、气味、温度等。比如,“我当时到上海的时候专门找了做家乡菜的馆子,那家馆子的老板是我们当地福建人,我过去也不说普通话,就和他讲方言,当时非常有感触。”(受访者5号)

都市漫游作为一种在加速社会中主动抽离出媒介的个人性艺术实践,主张恢复个体被机器摆置和遮蔽的感官活性,借助于自然、人文、活泼的现实世界辅助个体将自我的感性认知与无利害的观赏结合起来,进而生发出一种由外在到专注自我内在感知的内在主体性建设的审美实践。“看看学校的银杏从绿变黄,看看山茶花从一个个花苞变成一朵朵花再到它凋零。其实这些景色每天都会变化,但你每天去走一遍,整个人的心情就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当你走到这些景观里面,你整个人就会获得一种很积极向上的能量,就是好像你要活过来了。”(受访者14号)

我当时去北京四合院拍照片,当时拍的是砖瓦,来了一位大爷专门给我讲他们这边的建筑,就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当地的人主动跟我搭话,我就觉得我也融入了这个城市的生活,跟这个城市的人有了对话。(受访者4号)

都市漫游者们在移动的过程中建立起宏大背景下的个体温情与“小叙事”,构造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临时地方”。如与一同行走之人的交谈,个体之间进行交流互动,缓解了人们在现实社会承受的压力与郁闷情绪,正是个体在驻留中与周遭人、物、景的对话,使得其产生一种对陌生之境的审美体验,由此引发出社区般共享的亲切意义^[25],这种亲切感的诞生同时是地方感的体现,一方面,特定的场所为聚集的人们提供刺激、引发反应设定了前提,另一方面,在交互实践中,个体逐渐熟知陌生的空间地点,在不经意中,“永久情感的种子已然被植入”^[10]。在虚实的断裂之间,地方中的停驻成为个体不断进行自反、参与日常生活世界的艺术活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在现代性中被重构为容纳所有生命、生长和活动的联结纽带”^[19]。

(二)视像存储:媒介点亮的“数字生命”

媒介摹写着人类的生命史,储存着生者的幻象,是人类生命的载体。在新物质主义看来,文化与物质不能分开讨论,作为数码物的导航地图是“机器的语言”,而作为意义、记忆、身份的个人记录是“人的语言”,也即,欲考察导航地图中雕刻的个体足迹,则离不开“计算层”与“文化层”的互织转换,正如马诺维奇所言,“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包含图像、文本和其他数据记录的无限度、无结构的集合,我们进一步将其建模为数据库的行为,其实是一个适当的,也是唯一的选择”^[26]。个体的足迹虽然以“视像点”的形式呈现,却充溢着无限的文化意涵。

一方面,导航地图是一幅由操作着(operating)的物质动作构筑的数据地图,打开搜索引擎、点击图标、键入文字、点击语音播报、输入地点、展开图示甚至包括沿着图示走路、手举设备的姿态都显现出物的物质状态。另一方面,当物形成时,也就是个体点亮城市的时刻形成时,它同时又询唤个体进行继续绘图的欲求,恰如高德地图的“点亮星星”设计,标记个体已经走过的城市,且达到一定里程,平台会赋予个体“步行大使”等称号。也如受访者8号所说,“会有一种鼓励你去多走走,然后争取把这些能点亮的地方都点亮一下。激发我对这个城市进一步探索的欲望。”

而这些“微光”数据集纳个体的数字记忆、储存个体去到每座城市的异质深厚情感。一方面,作为文化的记忆被物化,贮存在作为导航大脑的地图装置中。当我们在行走中书写的电子视频、文本图片、给家人、朋友分享的关于城市一隅的剪影,甚至是以反复检阅、手指滑动的姿态一遍遍地回访去过的地址、点亮的城市,都透着个体记忆的物质属性。另一方面,个体绘制出交缠互织的“线之纹理”糅合着这一时期、一群人信仰之基本态度,营造起都市行走者的精神图腾。在米歇尔看来,图腾是人造物,人造形象。但它们具有独立的生命。它们创造了它们所指代的社会构型^[27]。个体在后续的都市行走中将历史与现在连接起来,重新叙写与激活隐藏于时空之中的地方档案。诸如人们在已有的行走版图中继续加入新的地方、新的景色,记录与标注出在匆忙无感情的日常生活流中短暂而有价值的停留,展现出一种发现日常生活的美学和情感的创造力。也正是个体在对视像媒介的日复点击中,铸造个体对地方城市的依偎与眷恋。正如阿斯曼在对地点复活现象的论述中提到,地点可以超越集体遗忘的时段证明和保存一个记忆。地点把回忆重新激活,回忆也使地点重获新生。^[28]

此外,描画出的视像物储存的是关于个体的人生记忆、走过的历程,也勾勒出个体的数字面孔、建模出一个数字化的自我。这是人们从关注物质的外在存在转向自我内在心灵的过程。导航地图

作为应用软件,其本身的社交属性不强,因此使得关于地图上的足迹在某种程度上是冗余的日常碎片但也更真实。诸多受访者向笔者展示的关于创建走过的路程、创建的收藏夹视图都是未成体系的、散乱的,但恰恰是这些冗余的碎片信息“以另一种形式帮我们储存和记忆”(受访者11号),构成了个体的在世栖居性(being in the world)。

我跟滴滴司机能说两句,跟某一店主也能说两句,可能分别之后,我们的人生不会再有交集。但这些经历是我自己不能离开,是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访者5号)

由数字物所建构出的“地方”是一个存放美好回忆的档案馆。它可以使人看到自身的脆弱性,也令人感到安心。由导航地图中介的行走实践是一种物质性的技术刻写,其以某种程度上“不能删除”的方式重新确认人们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坐落中的行动与在场,与此同时物质性的足迹链条也记录着关于个体的生活记忆,标注的是关于个体在日常生活文化经验,也是个体在关系、思维和历史进程中的开放性。

我只是看着就能想到很多旅途往事,我就将它留着了。(受访者5号)

在此意义上,个体在导航地图装置不断留存与“点亮”的视像又何尝不是关于每个人生命存在的开放性体现呢?

六、回归之路:在虚实结合处走向自我的韧性

都市漫游者将自身的日常行走痕迹镌刻进导航技术装置,既将无数的时间碎片收集起来,也将与当时所攸关的情感状态与记忆储存进去,这样记录的形式充实着我们扁平的生命,滋养着我们的情感与记忆,令个体有依凭与归属感。然而,当漫游者在面对导航失灵、路线不准等障碍的情况才能分清虚幻与真实,也正是在这些时刻我们能找到自我,培养应对风险的能力。过于沉湎于旧时光,反复滑动与回味已逝的岁月不利于漫游者们自足完整性的主体建立。保持向前看,积极地参与和介入,勇敢地面对未知的风险,这样的进取与开放姿态应当是属于每位漫游者修炼的课题。只有真正地参与进日常实践过程,才有望培育一个韧性自我。以导航地图作为考察方式,某种程度上是由具体的媒介实践考察其间人的生活方式。在当下的功绩社会中,日常生活不应被视为预先设定范畴内的不协调存在,而应被理解为在任何一个鲜活社会中持续进行地方建构和尺度生产的积极贡献者。^[29]以“路”为媒,则又是发掘路本身在数字技术的中介下人—媒—社会的连接性。而在此期间由“走路”产生的时空变换、虚实交转、物质留痕、停留驻足皆隐喻着人类自身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境遇。因此,发掘导航地图的媒介性、剥除导航的技术外衣则是回归本体论上人之存在意义的解读。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64.
- [2] W.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H. Eiland, K. Mc Laughlin trans. Cambridge: The Bec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349.
- [3] 约书亚·梅罗维茨. 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肖志军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110.
- [4] 许同文. “位置即讯息”:位置媒体与城市空间的融合. 新闻记者, 2018, 6:12-18.
- [5] M. Sheller, J. Urry.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2006, 38(2):207-226.
- [6] 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 韩莉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5.
- [7] K. Hannam, M. Sheller, J. Urry. Mobilities, Immobilities and Moorings. Mobilities, 2006, 1(1):1-22.
- [8] J. Lee, T. Ingold. Fieldwork on Foot: Perceiving, Routing, Socializing//S. Coleman, P. Collins. Locating the Field: Space, Place and Context in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20:77.
- [9] T. Cresswell. Place: An Introduction: 2nd Edition.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14:37.
- [10] S. Kinsley. The Matter of ‘Virtual’ Geograph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4, 38(3):364-384.
- [11] 段义孚. 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王志标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112;143.

- [12] M. Parker. Containerisation: Moving Things and Boxing Ideas. *Mobilities*, 2013, 8(3): 368-387.
- [13] T. Cresswell. *Mobilities II: Still.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 36(5): 645-653.
- [14] 谢静. 移动社区: 沟通性视域下的第三地方——兼论新游牧主义的社区传播. *南京社会科学*, 2021, 11: 102-112+178.
- [15] 孙玮. 传播: 编织关系网络: 基于城市研究的分析. *新闻大学*, 2013, 3: 1-12.
- [16] 胡翼青, 谌知翼. 作为媒介性的生成性: 作为世界的媒介. *新闻记者*, 2022, 10: 3-15.
- [17]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 欧阳景根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2.
- [18] 虞鑫, 李一诺. 寻找失落的附近: 数字游民的流动社交与空间实践. *新闻与写作*, 2024, 12: 5-15.
- [19] 彼得·奥斯本. 时间的政治: 现代性与先锋. 王志宏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29.
- [20] 蒂姆·英戈尔德. 线的文化史. 张晓佳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3: 228; 293.
- [21] 卡罗·罗韦利. 时间的秩序. 杨光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9: 1.
- [22] 保罗·维利里奥. 消失的美学. 杨凯麟译.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8: 2.
- [23] 项飙, 张子约. 作为视域的“附近”. *清华社会学评论*, 2022, 1: 78-98.
- [24] J. E. Katz, M. Aakhus. *Perpetual Contact: Mobile Communication, Private Talk, Publ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2: xxii.
- [25] T. Cresswell. Place: Encountering Geography as Philosophy. *Geography*, 2008, 93(3): 132-139.
- [26] 列夫·马诺维奇. 新媒体的语言. 车琳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20: 293.
- [27] W. J. T. 米歇尔. 图像何求: 形象的生命与爱. 陈永国, 高焱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114.
- [28] 阿莱达·阿斯曼. 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潘璐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13.
- [29] M. Kärholm, T. Jensen, L. Foroughanfar, et al. Migration, Place-making and the Rescaling of Urban Space.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3, 31(2): 270-286.

Mediating through Roads: Media Practice and Self-Resilience Based on Navigation Maps

Chen Shihua (Nanchang University)

Chen Fangyuan (Jiangxi Polytechnic Institute)

Abstract: Technology creates a digital media ecosystem that individuals inhabit, where they perform cultural behaviors and construct the meaning of daily life through mediated practices of navigation maps within a topological network they buil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patiotemporal relationship changes and emotional-object entanglements generated when people specifically use navigation during movement, and reveals how locative media provides pre-planned guidance for the mobile behaviors of urban wanderers. The combination of stationary location stays and the embodied contact gives rise to flowing emotional memories. However, when navigation media operations become asynchronous or encounter conflicting obstacles, the emergence of these rupture points also serves as a key moment for individuals to discern reality from illusion, ultimately shaping a resilient self.

Key words: digital life; navigation map; media practice; resilient self

■ 收稿日期: 2024-08-30

■ 作者单位: 陈世华,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西南昌 330031

陈方圆, 江西工程学院语言与传播学院; 江西新余 338000

■ 责任编辑: 刘金波